

## 一九二六年北伐的片断回忆

陈 颐 鼎<sup>①</sup>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又是北伐战争六十周年。我作为一个黄埔军校毕业学生，忆往昔峥嵘岁月，不胜感慨万端！孙中山先生为彻底扫除军阀势力，生前曾亲身进行两次誓师北伐，一次是一九二二年广西桂林的督师。此次因有陈炯明公开背叛革命，使人暗杀邓铿（仲元）将军，囚禁廖仲恺先生，广东形势一片混乱，中山不得不中止北伐，回师广州。另一次是一九二四年，于广东韶关再次进行北伐，由于孙中山所统领的所谓粤军、滇军、赣军、鄂军、豫军等等听他指挥者是少数，且内部矛盾重重，加上广州城发生商团武装叛乱，一时广州形势十分紧张，为平息叛乱，中山再次中止北伐，回师广州。自此之后，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合作中，进行了两次东征，平定了陈炯明叛乱，回师广州消灭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再度挥师肃清盘踞广东高雷八属和海南岛叛军，广东这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工作终于完成。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五年因病与世长辞，北伐成为他的未竟事业。为了继承中山遗志，广东革命政府于一九二六年夏进行了第三次北伐。下面谈谈黄埔同学在北伐初期的几个片断。

---

<sup>①</sup> 陈颐鼎现为江苏省政协常委。

## 一、出师前广东概况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创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局面。在一九二五年间的两次东征中，消灭了陈炯明的叛军，回师广州后，又迅速地解决了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的军阀队伍，表面上统一了广东。

一九二五年七月以后，广东军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委员有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谭延闿、朱培德、蒋介石、伍朝枢，汪精卫兼任主席。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下令各军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一律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一时间广东革命空气异常热烈。在政治方面提出严惩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统一税收等口号；在军事上采取整编旧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服装、统一军令的办法，将原属黄埔军校系统的部队和粤军谭曙卿师合编为第一军。初期，蒋介石兼任过军长职务，后改由何应钦担任，周恩来、缪斌先后任党代表；原湘军编为第二军，谭延闿兼任军长，李富春任党代表；以原滇军朱培德部和赣军李明扬部合编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原粤军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罗汉任党代表；原福军编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李朗如任党代表；原鄂军编为第六军，程潜任军长，林伯渠任党代表。由于政府采取了上述一系列的统一措施，触及了广东一些旧官吏、军官的利益，遂又形成另一场尖锐斗争。如当时广东一些反动政客、旧高级军人目睹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感到自身有被打倒的危险，遂密

谋推翻革命政府。他们以拥护原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为名，与香港英帝国主义和陈炯明相勾结，阴谋发动政变，幸而这项阴谋被及时察觉，在一九二五年底由我们黄埔军校师生协助有关部队将驻在广州附近密谋叛乱的梁鸿楷、张国桢、郑润琦、许济、莫雄等部全都缴了械，并活捉他们，将其囚禁起来，使国民政府转危为安。

## 二、北伐问题的争论与国共两党分歧公开化

出师北伐，打倒军阀，推翻北洋政府，重建中华民国，这本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可是到一九二六年统一广东准备北伐之前，国共两党间对这一问题出现了不同见解，联合战线发生了分歧。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不包括西山会议派），从单纯军事观点出发，过份强调军事，不重视发动、组织工农群众，不问是什么集团、什么军队、什么人，只要表面上宣称服从国民政府领导，愿意参加国民革命，即引以为同志。共产党的主张是：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健全起来，整理好广东，巩固了后方，提高了战斗力，再出师北伐。由于以上原因，因而在一九二六年春夏之交，共产党人刊物《响导》上刊登了很多关于北伐的论文，大部分都是为批判蒋介石的单纯军事观点而发。蒋介石也在公众集会上指责共产党破坏他的“北伐大业”。双方闹得很僵，两党分歧从此公开化了。

## 三、北伐军组成与战略部署

一九二六年夏，国民党举行二届二中全会，在人事上略有调

整，国民党中央设主席一人，推选张静江担任，组织部长改选陈果夫担任。新增设的军人部长由蒋介石兼任。这时林伯渠在国民党中央任秘书长，刘伯垂任书记长。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因病出国疗养，推选谭延闿代理国府主席。

当时的形势是：直系军阀正调兵遣将南下，有利用湖南督军赵恒惕作前驱进攻广东企图；湖南唐生智与赵恒惕矛盾日益尖锐，我们如以重兵出师湖南，争取唐生智倒向革命，用唐的部队消灭赵恒惕，就可以打击直系军阀南进意图。这样既能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又能对进军长江流域形成有利态势。

一九二六年三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负责整编所有国民革命军部队，仿效苏联红军设立各级党代表及军、师政治部制度，各级党代表与部队军事首长有同等领导权。是年初，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于国民党改组后，特派白崇禧为代表，到广州与汪精卫、谭平山、蒋介石等商谈两广合作，并表示广西军队接受国民革命军番号，参加出师北伐。双方协议达成后，广西原有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白崇禧得到蒋介石特别赏识，后来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副参谋总长。

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的蓝图已大体准备就绪。六月一日，湖南唐生智通电就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和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职，刘文岛任第八军党代表。七月一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七月九日，蒋介石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军队，黄埔军校第四、五两期师生，广州各界人士及群众团体，不下数万人。先由蒋介石作誓师讲话，继由邓演达作激昂慷慨演讲，最后由吴稚晖代表国民政府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旗。

当时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组织，除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秘书长邵力子、参谋总长李济深、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外，下设十多个处，主管人员大都由黄埔军校师生中调任。

北伐军战略部署是：以主力由广东韶关出发，进击湖南及湘赣边境，直趋武汉，歼灭吴佩孚有生力量，然后挥师南浔铁路沿线，消灭孙传芳部队。另以有力一部由潮汕地区进击福建，直趋江、浙摧毁孙传芳老巢。当时双方军事力量对比约为一与四之比，我军约为十万人，敌方约有四十万人。在敌强我弱情况下，采用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先打垮吴佩孚，再歼灭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根据这一方针，当时兵力部署以第四、七、八军沿京广线向吴佩孚进攻，以第二、三、六军，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向江西方面孙传芳进攻，以第一军何应钦部（欠两个师）向福建、浙江进攻。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军先遣支队。

各路大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出师北伐，高唱革命歌曲，以“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口号作行动纪律，深受群众拥护。师行所至，鸡犬不惊，沿途群众为部队运粮、运弹、运送伤病员，主动支援前线。部队自广东出发之际，正值酷暑季节，粤北、湘南特别是碓石、宜章一带地区又霍乱流行，在缺医少药情况下，部队死了不少同志。

#### 四、长沙会议后的军事行动和我的战斗经历

我在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留校在第四期入伍生第三团第四连当排长，团长是张治中。时隔不久，第四期入伍生举行甄别升学考试，考取的升入第四期军官团，没有考上的编入第五期入伍生第二团，第四期入伍生第三团番号撤销。我在第三团番号撤

销后被派到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三连当连长，师长王柏龄，团长薛岳。我们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在出发时，被列为总预备队战斗序列，沿粤汉路向湖南前进。湖南唐生智倒向革命，并通电就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后，湖南形势急转直下，唐生智部队很快攻占醴陵、长沙地区，北伐军第一期作战计划遂告顺利完成。

八月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到长沙召开军事会议，策订第二期作战计划。以原黔军袁祖铭、王天培两部分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第十两个军，袁任第九军军长，王任第十军军长，编为北伐左翼军，袁祖铭任总指挥，从湘西出荆州、沙市地区，封锁长江上游。第四、七、八军为中路军，唐生智任总指挥，直取武汉，攻占武胜关。第二、三军为右翼军，朱培德任总指挥，集结攸县、醴陵地区，先监视江西来犯之敌，尔后向江西进军。第六军、第一军第二师为总预备队，集中长沙、平江、浏阳地区待命。第一军第一师为右翼军预备队。

当时我右翼军根据孙传芳联军内部实力雄厚这一实际情况，采取零星的局部作战方针，有时袭击马回岭，有时袭击乐化，有时袭击牛行和南昌，也有时各处同时袭击，而且夜战多于白天。一遇孙军出击，就后撤隐蔽。这样零星战斗拖了一个多月。这时，我军在赣江两岸调集大部兵力，为发动总攻准备条件。孙军在这段时间因未遭遇我军主力，便错误地低估北伐军的作战能力，骄气十足。由于孙传芳自认为实力超过吴佩孚，他妄图待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再派大军去收复武汉、长沙等地，到时五省联军便可扩大为七省了。因此对吴佩孚请援观望不前，并派其亲信大将卢香亭率领大军进驻南浔路，伺机行动。

江西督军邓玉琢不是孙传芳嫡系，该部防守赣州、吉安等处部队，被一一击溃消灭，自感在孙军大军入赣的情况下，就是能

把北伐军赶走，江西地盘也不会是自己的，因而斗志低落。故两军在赣西地区的战斗时起时歇。南昌是东南地区战略要地，关系战争成败。要夺取南昌，必先切断南浔路的补给线，北伐军派程潜的第六军加入到江西地区去，并要该军在牛行、万家埠、梅岭等处对孙军组织进攻。经激战数昼夜，仍不得手。我们第一师被派增援上去，也未得到进展。某天早晨，白崇禧乘坐赣江小轮船亲临牛行督战，并随船带来现大洋多箱，备作奖励作战有功官兵。那知船甫靠岸，正值孙军郑俊彦第十师对牛行车站进行猛烈进攻，守牛行部队抵挡不住，纷纷败退下来，不少士兵扑上白乘坐的小轮船企图后逃。由于人多船小，超出了船的负荷量，船开不动，且在慢慢下沉。这时白命撬开银箱，把大洋纷纷洒向江岸，一些爬到船上的官兵，为了要抢大洋，又离船上岸，小轮船才得以开走。白常自吹他这一手是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

南昌久攻不下，孙军援赣军总司令卢香亭率第二师、第十师和两个独立旅已进驻南浔路，谢鸿勋的第四师正在九江登陆，孙传芳本人亲率周凤岐第三师、陈调元第六师亦将集结九江，企图与我军决一死战，以解南昌之围。九月中旬，蒋介石偕加伦顾问亲到我们第一师驻地丰城附近，集合部队连长以上军官讲话，大意是当前形势紧迫，只有迅速攻占南昌城，才能扭转这一态势，北伐成败在此一战；只要发扬东征时期攻淡水、夺惠州的精神，就没有攻不下的城市等。

我们一师第三团立即组成四个敢死队，我被选为第一队队长，每个队长要自立军令状当众宣读。当时被选上的都是黄埔军校同学，彼此互策互励，人人奋勇异常，视死如归。

某天黄昏，我军炮火猛击得胜门，我队官兵从城墙缺口冲进城内。由于后续部队未能跟上扩大战果，冲进城内的四十多人遭

守城敌军多方反击，前进不能，来路又被敌封锁，几乎全部被敌活捉。我从相距不远地方看到，被活捉的战友中有两人立刻被敌人砍下脑袋。我急得无法躲藏，适巧靠近身边有条阴沟，就立即跳下。时值深夜，没被敌发现。哪知这条阴沟正是通向城外的下水道，我不顾污泥没膝，费尽力气，从阴沟洞中爬出城外，才得归队。

时隔约一天，再次组织爬城战斗，吸取上次失败经验，采取大中小云梯并用，在城四周围一齐上。我们第三团四个敢死队都爬进城内，同守敌在洗马池、扁担巷等处巷战一天多，最后弹尽，干粮补给不上，又几乎全部被敌消灭。我在走投无路中想寻找上次出城阴沟，由于地面不熟，又不敢向城边去找，料想这次一定是完了，就想先躲藏一下再说。我去敲靠近不远的江西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大门，这时学校早已停课，校内仅有少数员工留守。我几费口舌说通门卫，见到该校留校教师陈剑农先生。我坦率地告知他我的身份，并请求他允许我暂时在学校躲藏。陈先生出于对革命青年的爱护，将我掩藏在学校小楼的一间油印室，约有大半天时间。当天黄昏后，听到巷战枪声就在附近，我即离开那间小楼向枪声处跑去，遇到第三军第七师一位姓寸的营长把我收留下来。后来不知何种原因又随部队撤出城外，归还原属部队。

我最后一次参加爬城战斗，是中秋节的后几天。我刚爬上城头，即遭敌炮弹片击伤腰部，滚落到城外，已不省人事。后来，由于清扫战场，发现我还没绝气，经多方抢救才没有死去。南昌城守敌有岳思寅、唐孚山、张风岐等四个师，以岳思寅兼任警备司令，统一指挥。他们凭藉城高池深，与我军鏖战达三个多月之久。听说，孙传芳与蒋介石曾同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有点交情。在我军进军江西时，蒋派金佛庄去南京，劝孙归顺革命，并许以优厚待遇，



而孙传芳自恃兵强，地方物资充裕，没有把北伐军看在眼里，不但不投向革命，反而把金佛庄杀害。

当我军攻占南昌时，守敌的四个师长全被活捉。人民群众坚决要求要把这四个师长先游行示众再处决。我军则劝说群众，可以看，不要打，但由于他们对南昌人民造恶过深，在游行示众时，唐孚山的胡须被群众拔光。后在北伐军总部前院广场对他们进行审讯后即执行枪决。

南昌战斗全歼守敌，迫使孙传芳在江西全面撤退，准备保全江、浙。为不给敌人有喘息时间，我军以第六军、第三军之一部立即向皖南挺进，截击由水路后撤之孙军。另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指挥第一、二、二十、二十一师，李明扬先遣支队等，沿浙赣线向浙江尾追由江西后撤之敌。我在南昌医好伤口后，调升本师第一团第三营营长。

一九二六年底，我军进入浙江地境，在先声夺人情况下，首先有周凤岐、陈仪部队倒向革命，继而浙江省长夏超在杭州宣布独立。孙传芳急派部队缴了夏超的械，并把夏超就地枪决。但军心已经动摇，原定在金华、兰溪、建德、富春江地区与我北伐军决战的计划，也无法实现。此时何应钦率领的东路军在攻占福建后，已与我沿浙赣线前进部队会师衢州，战斗力更加增强。又与孙军孟昭月、上官云相等部在龙游、游埠、航埠等地激战多天，终于将这部敌军击溃。孙传芳经此一役，其精锐部队损失极大，福建、江西两省已相继被北伐军占领，浙江危在旦夕。此外，孙传芳还担心安徽的陈调元倒戈。因此，孙传芳决定放弃江南地区的作战，全部撤驻长江北岸，与北方友军结成联盟，企图在壮大实力后，再图反攻。

我东路各军乘破竹之势，尾追败退之敌，一九二七年二月占领

杭州，三月攻占上海、苏州、镇江、南京等城市，其中虽有嘉兴、松江、上海、吴江、苏州、镇江、南京等处战斗，但多系与败退之敌掩护部队的作战。上海战斗消灭毕庶澄部约一万多人，缴获军用物资颇多。占领上海后，我第一师即渡江进攻南通，与孙军第九师李宝章部激战两日，将其击溃北逃，追击到海安附近，遂奉命停止北进，撤回上海待命，我们第一团驻南市高昌庙。

四月十二日这天早上，营党代表刘武林（共产党员）告知我，他去师政治部开会，中午不要等他吃饭。自此一去未回。第二天，听第二营营长韩继周对我说，现在正在“清党”，社会上在乱抓人。其他情况我们一无所知。约在四月底，我们接到本师师长薛岳印发的告第一师官兵同志书，大意是：自己身体多病不能再工作下去，离开部队以便安心疗养，我没有带走公家一分钱，所存公积金均由军需人员结算清楚，作为加发你们的薪饷等。全师官兵对师长这种“挂印封金”而去，无不感到震惊。事后才听说，师长乃是不愿意看到国共两党合作变成两党斗争而离开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